

回忆父亲唐绍林

唐辰功 唐新生 唐巧燕 唐燕军 唐会生



唐绍林，祖籍广东珠海，1920年8月生于北京，1938年6月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11月为陕北公学、延安抗大学员。1939—1940年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队、三八六旅文化干事、宣教干事。1941—1947年历任八路军冀南军区三分区随军记者、邯郸大队教育干事、教导大队副政委、教导员、冀南军区三分区宣教科副科长兼报社社长。1948—1949

年10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纵队四十二旅宣教科科长，七十军文工队队长，二零七师宣教科科长兼战斗剧社社长等职。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解放后，唐绍林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校、空军七师政治部文化科科长，北京军区空军文化处副处长，空六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空军潍县场站政委，潍县基地政治部主任等职。

1964年，唐绍林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任计划司综合计划处处长。1977年调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历任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党领导小组副组长、综考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2001年10月30日，唐绍林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一岁。

父亲出生在北京，爷爷在铁路做事

我们的父亲唐绍林 祖籍广东珠海唐家湾，1920年生于北京 当时我们的爷爷在铁路做事）

父亲小时候，爷爷在铁路做事。居住在中山会馆（位于北京市宣武区菜市口）的老广东都知道我们的爷爷唐益定。爷爷的名字叫尧宁，他的字是益，我们爷爷这一辈的字是益；祖爷爷那一辈的字是宗，我们的三祖爷爷叫唐宗交，大名叫唐斋生。爷爷在没来北京工作之前，在家就跟我们的广东奶奶定了婚，我们的广东奶奶姓卓，名字叫卓金允，家住在下栅。

我们的亲奶奶名字叫周兴宝，是上海人，她是经人介绍与爷爷成的亲。我们的父亲唐绍林先在北京就读杨家园小学，后又跟爷爷调到山海关，在山海关就读扶轮小学（是铁道部办的），父亲还在天津住过。“九一八事变”后，炮火连天，爷爷失业了，跑回北京住闲，过了两年，生活实在无法维持，只好带着我们的亲奶奶和父亲回到老家广东，投奔我们的大姑姑唐淑明（当时我们的大姑姑和姑父在广州。我们的大姑姑唐淑明曾是“南国剧社”成员，和著名剧作家田汉同台演过戏，1998年12月18日病逝于北京）

1933年回到广东，那年我们的父亲13岁。我们的亲奶奶晕船，身体也不大好。到了广州，闹病闹得好厉害，正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姑父胡春冰被捕入狱（姑父胡春冰是左翼作家，他在好几个报社兼副刊编辑，还兼中山大学教授，会好几国文字，是个文人、才子，写过好多剧本、电影剧本，后来移居香港）。我们的亲奶奶遭受了这么一个打击，刚到广东就病倒了，奶奶这一病就是几个月，就没起来，死在广州，也没见着我们的姑父，连老家唐家都回不了。当年父亲13岁。

回到老家，父亲的广东话说不好，马马虎虎学了点，能听得懂。

那时在家里，我们的爷爷说广东话，奶奶说上海话，父亲说北京话，仨人三下子。回到唐家，广东话不行，父亲耽误了一年多，重新上六年级，读了半年，这时老家已有了我们的小姑姑唐淑英和叔叔唐绍祥（小姑姑和叔叔都是我们的广东奶奶生的）。回到唐家之后，爷爷没有工作，生活困难，父亲该上中学了，爷爷供不起，只好把父亲过继给三祖爷爷当孙子。那时三祖爷爷、三祖奶奶都在，他们有点家底，生活好一点，愿意叫父亲过去。于是父亲就考上了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在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乡），因为唐家没有中学，这样三祖爷爷供父亲上了中学，大姑姑也不时寄点零钱给父亲花。每到寒假暑假，父亲就上广州姑姑那住一段时间，有时还帮姑父抄点东西、抄写剧本等。

父亲瞒着爷爷，十七岁上抗大，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中学上了一年半，“七七事变”爆发，飞机天天从三灶起飞，经唐家、中山，轰炸广州，父亲上到初二上半年，就断学了，跑到广州。1938年寒假，父亲又上广州，这时候，碰到一个人叫犁觉彝，他是姑父的学生（犁觉彝，1937年当战地记者，到过陕北延安，1938年在广州）。他向大家宣传，说陕北搞统一战线，打日本，国共合作，好多大城市的学生都到陕北来了，上陕北公学院，上抗大，上鲁艺，上马列学院，等等。这时经常有年轻学生到姑父这里来，他就宣传。有一天，他说他要回陕北，父亲说好啊，你把我们带走。他同意了，带父亲他们到广州办事处。父亲想，这事要是跟爷爷说，准不让走。所以不能说，等到了再说。这时候，姑姑正在广西一个战地文工团，只有姑父一人在广州（此时，姑父已从大牢里出来了，他是1933年进去的，1935年前后才放出来，坐了将近两年监）。这样犁觉彝同意带父亲他们走，但是必须家长同意，必须自己筹集路费。父亲想了半天，这事得跟我姑姑说，可我姑姑又不

在，在广西，只能跟姑父说。姑父一听，说：路费我可以给你出，至于你走与不走，我不能决定。你爸跟我要人，我上哪找去，必须跟你姑姑说。后来姑父给姑姑发了个电报，姑姑想：奶奶不在了，爷爷在广东又是那种情况，过继的三祖爷爷也死了，于是姑姑没和爷爷商量，就同意了。

姑父给父亲准备了几块大洋，于是父亲一行八个人，跟着犁觉犇从广州出发，先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5月30日，大轰炸之后，国民党开始堵截去陕北的大后方青年。父亲他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混过去了。到了陕西汾洲，恰好汾洲专署的一个专员接待了他们，还挺客气。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到了延安（这个情况父亲他们后来才知道）。父亲他们终于进入了陕甘宁边区，过了关，到了陕北。本来父亲他们是想奔抗大的，这时延安抗大满员了。在陕甘宁边区有个俊仪县，搞了一个陕北公学校分校，罗曼是校长。当时要是上抗大也得先上预科，三个月；如果上了陕北公学，也三四个月，再上抗大就不用上预科了。父亲他们这一行七、八个人，有的愿意到鲁艺，有的愿意到抗大，愿意到抗大的不多。于是，1938年6月父亲先到陕北公学，陕北公学毕业之后，10月又走路到延安上了抗大。当时红大（红军大学）已经改名叫抗大，父亲是自愿上抗大的，那些同行的人，有的上了鲁艺，有的在陕公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吃不消、向后转了，回到大后方去做抗日救亡工作，就这样，我们的父亲1938年6月先上陕北公学，1938年10月到延安上了抗大（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国共产党主办，何长工任校长。父亲始终珍藏着抗大一分校的校徽），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艰苦抗战，转战敌人后方

1938年10月父亲到抗大，到了12月末、1月初，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党中央提出“到敌人后方去”办学校也得到敌后去，

一边打游击，一边上抗大，这时，何长工（我军有名的红军将领，一条腿瘸了，人称“拐腿将军”，父亲说他打游击很有办法）带他们过黄河，过封锁线。找了一个敌人松懈的地方，从那过黄河，然后过同蒲线，那是敌人的占领区，过了封锁线，进入晋东南，到了固安，也叫长池县，住在吴张镇。这时候，八路军总部也在晋东南，离吴张也就十来二十里地，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都在那，朱老总也在（父亲他们礼拜天上那去玩，看到朱老总在打篮球）。

父亲就读的是抗大一分校，抗大第五期（1939年1月份）。原定计划学习九个月，后来又缩短为七个月，准备“七一”结业，纪念党的生日。结果到了六月二十几号，敌人九路围攻大扫荡，父亲和战友们提前毕业、撤离。部队刚撤出去没多久，日本鬼子就占领了长池，到吴张镇首先占领女生大队的地方，不过部队都撤了，敌人扑了空。敌人速度很快，部队头天天黑走的，敌人第二天黎明、白天进到吴张一带。部队拉出去以后怎么办？宣布毕业，分配到各个部队。

父亲被分配到刚组建的一二九师先遣纵队，到平原发展，晋冀鲁豫。先遣纵队的司令员是李聚奎，王幼平（解放后曾在外交部工作）是政治部主任。父亲被分配到先遣纵队特务连，特务连有一个骑兵排，搞通讯的；一个侦察排；还有两个警卫排，保卫司令部、政治部。这个连的指导员叫赵平向（他是红军过来的，后来牺牲了）。这个特务连很硬，很能干，连长、排长、班长大部分都是红军，父亲就在这个连。这之前父亲还到过先纵的一个骑兵团。

父亲在先遣纵队特务连干了没多久时间，三八六旅要干部，父亲就跟他们进了太行山，调三八六旅政治部宣教科。宣教科下边管了一个宣传队，三八六旅很有名，父亲还兼他们的政治教员，即当文化干事，又管宣传队。三八六旅陈赓是旅长，总打胜仗。到三八六旅时间不长，组织上挑在职干部到一二九师学习，又挑上父亲

了。在职学习了三个月，又组织了一个在职干部工作队，到冀南平原扩军。因为父亲在平原干过，就到了冀南，开始在四分区。扩军就要找给地主扛活的，找富人谁干，穷八路。只能找穷人，贫农、扛活的，没东西，受地主压迫。父亲就住在牛棚里，跟扛活的住在一块，今天动员，明天动员，讲抗日的大道理，好几个月。父亲发展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当时的农会主席，叫杨易臣（很有名，解放后担任了一个部的部长，是个高级干部）。父亲完成扩军任务走的时候，路过冀南九分区，这时候八旅改编，九分区和一分区合并，成立一个三分区，非要两个干部，又看上父亲了，说他在平原干过。就这样父亲留在了三分区，以后认识了甘泗河、高厚良（高厚良当时是三分区的副司令兼参谋长，解放后任军委空军政委），参谋长叫张西山（后来到民航工作）。

就这样，父亲1940年留在三分区。这段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1942年、1943年、1944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其中1942年、1943年这两年最难过，冀南基本没有大反攻，十几里地内没有共产党的地盘，都是敌人的岗哨。部队化整为零，生活非常艰苦。

父亲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于1942年7月1日在三分区入党，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经过了抗日战争生与死的考验，1942年7月1日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规定入党预备期三个月。入党时父亲在分区宣教科，当时的科长叫陈洪涛（后来牺牲了），还有一个干事叫秦健，他们俩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部队化整为零以后，大部队不能活动了，机关不能存在了。这时候聋子伯伯张镜清（他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父亲和聋子伯伯没说的，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聋子伯伯一直在分区、邯郸大队，他的爱人、家属和父亲都很熟，

跟母亲的关系也不错)在组织科当科长,父亲当随军记者,也当了一段干部科干事。他们俩,还有一个同志李敬之,三人一起下放到邯郸大队。到1942年10月转正时没有介绍人怎么办,张镜清是父亲的候补介绍人,于是又增加了一个介绍人,他能证明父亲在分区已经入党了,所以父亲在邯郸大队转为正式党员。那时邯郸大队经常在河东河西、阳河两岸和邯郸铁路线活动。当时东线是咱游击队的,西线是敌占区,经常晚上进敌占区,白天进游击区,搞宣传,抓汉奸。父亲在邯郸大队干了两年,1942年、1943年,比较艰苦,做实际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扩军,发动群众慰问八路军,到了1944年已经提出“今年打败小日本,明年打败西特勒”的口号。父亲天天晚上带着游击小组,封锁炮楼,然后喊话、宣传;半夜召开群众大会,把岗哨布置好,怕给敌人通风报信。开群众大会,开干部会,对伪村政权的人宣传,你要人在曹营心在汉,以免将来人民找你算帐。这时邯郸大队政委牺牲了,父亲跟着的连指导员也牺牲了,他在父亲前边,父亲跟在他后边。好多次被敌人包围了,突围出去,经常有突围。父亲说:现在看高厚良回忆录中写的冀南这段,牺牲了好多县团以上干部,大部分都是在突围时,那时日本鬼子搞铁壁合围,四面包围八路军,你必须带着部队突围出去,否则全完蛋,整个被敌人消灭;突围出去,保存多少算多少。这是1942年、1943年。

1944年初情况又好起来了,机关又成立了,父亲又调回分区教导大队,开始当政治教员。

父母亲在抗战胜利时结为革命伴侣

1944年初父亲调到教导队,没多久,又调回分区政治部,当教育干事,还兼随军记者。当时教导大队要扩大,要招收一批敌后青年知识分子,除了两个连之外,成立了一个学生队。父亲在分区没

呆两三个月，又调回教导大队。当时的副政委就是给聋子伯伯儿子的老谢，叫谢惠民（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后在沈阳军区工作），他是政委，父亲是副政委。那时教导队经常在河北馆陶县内比较大范围的根据地活动。

父亲和母亲认识时，母亲已在区里当抗联副主任。介绍人是父亲的一个民运干事，叫张勇征，他跟父亲是同事，张勇征的爱人跟母亲是同学，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本地人，馆陶县的，父亲的部队经常去房儿寨（那是母亲的老家）活动，打游击，三天两头去房儿寨、孩儿寨、芽窝，在大名县、馆陶县两个县交界的地方活动，离

敌人的据点很近。1944年，父亲和母亲认识。

1945年，抗日战争末尾，日本投降后，邯郸解放，父亲跟母亲在芽窝正式结婚（父亲始终珍藏着他和母亲的结婚照）。那个时候，部队要求团以上干部才许



结婚，而且要经过很严格的手续，一般不批。父亲的个人活动量大一点，那时候也比较活跃，当过一段随军记者，还当过教育干事，后来又办教导队。当时我们的母亲还是地方干部。结婚之后，大名城关区的抗联部队又组织刚解放的大名市城区学校，要我们的母亲帮助教歌，搞文艺活动。后来又把她请到抗高当教员，当时抗高的校长叫崔长青，非请她去。直到父亲调到冀南军区，母亲跟父亲调到一块，也穿上军装了。那时冀南军区改成十四纵队，母亲一直在十四纵队妇校当副队长，并兼政治教员。

当时结婚要经过分区批，过好几级，教导大队、党委、总支。

父亲跟母亲结婚在当时还算比较正规，在芽窝举行的仪式，那时大名已经解放了。我们的母亲当时在大名城关区工作，搞发动群众，认识照相馆的。开照相馆的是父亲的老乡，是个广东人，所以照了一些相，那个老乡从大名专程到芽窝给他们照结婚照（这些珍贵的相片，父亲一直精心地收藏着，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纪念）。

父亲跟母亲结婚时，参加婚礼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郝洪恩（他是日语翻译，解放后任民航政治部主任）。父亲告诉我们：郝洪恩那会儿做日本人工作做的不错。他曾被敌人俘虏过，敌人俘虏他之后，他会说日语，他是日语翻译，他能做日本人工作，又了解了日本人情况，他人在曹营心在汉，他能把日本人的情报送出来，他并没有投敌，被抓之后，也没招认，敌人也不知他干什么的。他没什么事。“文化大革命”整得他够呛。

参加婚礼的还有一个人，是个协理员，叫赵高运（他现在也在北京）。结婚照上还有一个人叫郭英惠，他是老广，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他后来在国防工委工作，住在黄寺。在晋北时，父亲曾去看过他，他走的是胜利路线，他不同意当时战争年代的路线。他是搞组织工作的，是组织干事，他的文化程度高一点，是高中学生。

父亲跟母亲结婚后又调回分区当宣教科副科长，还兼办《先锋报》。

母亲王巨波

我们的母亲王巨波（原名王明华），1921年生于河北省馆陶县。1938年夏天，正在师范求学的母亲认识了八路军东进纵队工作团办事处主任梁国栋，在他的教育启发下，懂得了一些打日本、救中国、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道理。随即给自己的同学写信，说明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天职等道理，很快即召集起来十多名同学，组织了本县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母亲年仅十

七岁。

我们的母亲能说能干，很有才华，又有一定的文化，在馆陶县地区妇女抗日救国运动中很有名气，历任馆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冀南军区三分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部长、冀南军区第二专署宣传队分队长、冀南军区一分区妇救会改善部长、元城县抗联妇宣委员、大名县五区抗联主任，四区抗联副主任、冀南军区三分区广平县城关区抗联副主任。父亲曾



告诉我们：母亲是个能干的妇女，能讲、能唱、也能说，还能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还会写诗，是个有文化的妇女干部，在大名地区家喻户晓。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历任冀南军区三分区肥乡县抗高教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教科干事、冀南军区妇校二队教员、解放军十四纵队妇校二队副队长等职。1954年10月转业到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处，后又调到天津市煤建公司秘书科工作。1956年因身体不好，经上级批准退職。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我们的母亲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将自己的宝贵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母亲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曾多次被组织派往干部学校学习，并于1940年到太行山鲁迅艺术学校受训，退職后相夫教子，多年担任部队家属委员会干部，终因积劳成疾，身染多种重病，于1972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一岁。

革命夫妻携手并肩，生死与共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1946年生了我们的大哥沐顺，因为母亲没奶，部队也不能带，就做工作放在我们姥姥家。姥姥和姥爷对父亲



是百分之百满意。父亲在部队，外号叫“知识分子”实际上父亲的文化程度只不过初中二年级，但他有闯劲，敢干。那时父亲经常写通讯稿，还办小报。父亲是怎么调到冀南军区的？就因为他办的《先锋小报》在三分区很有名，在整个军区评比都是最好的。那时经常行军，油印员就背着钢板，晚上开夜车，小报就出来了。父亲办小报在军区是出了名的。这样冀南军区就把父亲调去了。原来冀南军区政治部的报纸

叫《团结报》，父亲去了以后没多久，因为要支援前线，改名为《支援前线报》，父亲当宣教科副科长兼报社社长，还兼总编。

大哥沐顺放在我们姥姥家，费的劲可大了。在战争环境里，找个奶母很不容易，非得等着人家小孩去世了，赶巧了。后来找着奶母，才吃了三两个月。沐顺发高烧，在农村请大夫，也没治好，就死了。大哥沐顺没活多久，也就几个月吧，父亲和母亲都不知道，我们的姥姥急坏了，哭得半死不活的。

十四纵队成立没多久，军区没了，父亲被编到纵队四十二旅当宣教科长。十四纵队，冀南最后一个纵队。纵队司令石志伟，属二野，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那时整个冀南、整个晋冀鲁豫的活动基本都是刘邓管了。邓小平到冀南军区，整个活动都是他管，冀南军区整个是二纵、十纵。这会儿陈再道已经离开冀南军区了，甘维汉（解放后到大连，当了大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是政委。

父亲所在的野战军的任务是要消灭这一片敌人，当时很多县还没有解放，徐州、邯郸、小年还被敌人占领着，打完这些地方，又包围新乡，打黄河北桥。为了十二纵队上大别山，二纵、十纵去的人最多。父亲所在的十四纵队打到黄河桥，没过去，回来继续包围新乡。新乡很顽固，还有安阳，这是敌人最顽固的两个地方，外边修了很多碉堡，挖了很多河，放了很多水。敌伪和当地地痞，都很有名的，像“铁磨头”、王三柱这一伙，正好是冀南三分区的活动地区，部队又回过头来，围困这些地方，打这些地方。十四纵队是野战军，这任务就是野战军的。当时聋子伯伯原来是分区的副科长，这个时候就下团了，当政委。这些领导下到战斗部队后升得很快，因为前边的连长牺牲了，排长就上。父亲因为在纵队机关，有时参加一两个团的战斗，下去帮助做工作，直接指挥部队作战很少。那时机关人员伤亡也少，幸存的多，当然也死了一些，父亲前前后后有两个干事都牺牲了。

后来十四纵队改为七十军，七十军要成立宣传队，要搞一个军乐团。要找一个有组织能力、活跃的、有文化的人当队长；还要组织起个剧社，叫战斗剧社，父亲被任命为队长兼社长。当时冯征（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后任《解放军报》总编）当宣传部长，邵宗南在四十二旅当政治部主任。父亲原来在宣传科只是搞搞报纸，弄点宣传材料。这回调去搞军乐团。父亲这一去，军乐团还真鼓捣起来了，把战斗剧社也成立起来了。这时候四野往南下来了。它一南下，解放的速度加快了。安阳、新乡，父亲他们打了多少次，打不下来，死了不少人。四野把东北带的大炮调来了。那时候新乡城里有一个国防部榴弹炮团。这个榴弹炮团很厉害，父亲他们的部队吃了它不少亏。那时战斗很激烈，牺牲了不少人。父亲跟聋子伯伯，差点完蛋。父亲曾从攻城的梯子上摔下来，负了伤，走路一直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四野有威力，也有威望，很快就把安阳打下来了。

解放初期父亲调入空军

打完新乡，打完黄河铁桥，解放了邯郸，解放了新乡，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完成了任务，把黄河桥拿下来了，保证了野战部队南下。后来又接受了新任务，让他们保卫津、京，回涿县，驻守涿县，这已是1949年了。涿县是津、京的门户，那里是土匪最多的地方，要清剿土匪，不然不能保卫津、京的安全。那时父亲带着宣传队、文工队演了好多戏，反应还挺好。后来部队在涿县又整编了，改成二零七师。整编的时候，父亲已被任命为宣教科第一副科长，兼文工队队长、战斗剧社社长。



整编没多久二零七师部队上东北，接收高炮、防空兵。那时政治部主任是吴建初，政委是甘泗河（都是父亲的老战友），二零七师走，机关怎么办？机关到北京，跟在黄寺的炮司合并。这已是12月二十多号了，进北京，进黄寺（黄寺原是傅作义的炮兵司令部），解放后成立防空军，部队留了一部分干部，王正宁（也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后在民航工作）就留在防空军了。

这时，南苑航校需要人，当时白云（父亲的老战友，后任军委空军副参谋长）是参谋长，高厚良是副司令。白云动员七个人办航校，安志敏是从新疆飞行部门出来的，是校长，白云是参谋长。到南苑成立六航校，白云要了几个人，其中有父亲一个，搞宣传文化，当文化科科长，这已是1950年初。

从黄寺上了航校，当文化科长。搞文化，父亲不是外行，或组

织体育活动，或组织戏剧演出，有声有色。这会儿有苏联专家了。母亲也在六航校政治部图书馆工作，父亲在政治部，都在一个院里。父亲搞宣传工作搞得很不错，苏联专家挺满意。

1952年，父亲从六航校调到空军七师政治部（当时宋绍德是政治部主任，政委是葛振耀，他们都是父亲的老战友），继续当科长。搞业余活动，组织业余宣传队；体育运动也搞得不错，非常活跃，参加军区汇演，经常拿红旗、拿奖旗。

1955年，父亲又调北京军区空军。当时北空的文化部部长叫尚备，父亲是文化处副处长（那时文化处没有正处长，父亲就是负责人）。因为父亲搞文化活动有点名，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又把父亲调到北空。

父亲调到北空之后没多久，成立空六军，暂住杨村。到了1956年，空六军先在潍坊暂住，后搬到济南，父亲调任空六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叫朱兆林。

六十年代，父亲被提升为中校；历任空军潍县场站政委、基地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支援地方，父亲转业

1964年，父亲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任计划司综合计划处处长。经历了“四清”、“文革”的动荡年代，1977年，父亲调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历任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党领导小组副组长、综考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离休。

解放后爷爷寻找父亲，给毛主席发电报

父亲出来参加革命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怕写信给家里找麻烦（当时参加革命是要杀头的），后来爷爷知道父亲走了，他知道上陕北去了，但谁也不知道父亲到底去了哪。

1950 年，爷爷开始找父亲，爷爷给毛主席发了一封电报：

……小儿三八年上陕北延安，跟你去干革命，现在
在什么地方，没有下落，请给予……

爷爷的这封电报转来转去，转到军委空军，还就把父亲找着了。组织上还把父亲批评了一顿，说：解放两年了，你怎么不给家里写信（这封电报稿父亲曾给我们看过）？

父亲告诉我们：历史就是这么复杂，如果当时他在广东不走，很可能有几条路。一是到香港、到澳门，这是一条路；再一条路，参军——青年救国军，当时国民党也吸引青年参军；再一个上陕北。现在回头看，当时走革命道路是对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父亲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而我还活着。是共产党的教育培养，把我锻炼成为一个革命战士。

（本文根据父亲生前录音整理、摘编，文中引用的人名、地名如有不妥，敬请谅解）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一日

我当过一次回族人民的军代表

唐景雄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造反派”说我“站错了队”,我被迫离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械技术学校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的岗位,被下放到宁夏贺兰山总后军马场“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于同年10月从贺兰山军马场,被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任军代表,主要工作是到固原地区落实民族政策,至1972年4月任务完成后,回部队另行安排工作。

—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地区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做了很多工作,绝大多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也是如此,总的形势是好的,但在固原地区,情况比较复杂。固原地区是回族人口聚居的地方,建国以来,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宗教上层反动分子马震武及其余孽,利用宗教迷信和我们工作上的错误,先后在1950年和1952年策动了两起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在1958年、1962年和1969年又策划了五起预谋叛乱。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组织反击,使预谋叛乱没有得逞,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巩固了政权。但是在处理五起预谋叛乱案件中,由于一些地方偏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领导上主观臆断,夸大敌情,破案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逼供讯。有的破案人员为了“完成任务”,持

枪追问：“哪些人是叛乱分子？”一个公社有一个案犯一口“咬”了158人。破案人员又追问：“别的地方有妇女参加叛乱，你们这里难道就没有？”结果又“咬”了122名妇女，共计280人。于是，双目失明的老贫农成了“叛乱分子”，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成了“叛乱骨干”。有的地方把参加正常宗教活动也当成是参加了叛乱，有的把受骗上当的一般群众也定为案犯。在有些干部中存在着“回民落后论”的思想，对培养回族干部不够重视，对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够尊重，甚至有的干部还提出要回族人民养猪等等，影响了民族团结和农田建设，致使受害的人员政治上抬不起头，生产上提不起劲。有的生产队甚至出现了培养干部没有苗子，发展党团员、征兵没有对象的情况。

1971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的汇报后指出：宁夏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很不得力，特别是固原地区在处理平定叛乱的工作中，造成严重扩大化，必须迅速纠正。并且提出了具体措施，要求公安部领导立即带队组成调查组，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共同到固原地区深入调查研究，落实民族政策，尽快使受害的回族人民从困境中解放出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决定组成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调查组，对外简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定我担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从机关组织部抽调一位处长（回族）任副队长，从区委宣传部抽调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具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任秘书，还选调了好几位在自治区机关工作五年以上、熟悉农村情况的干部，共16人，其中党员9人，回族干部6人，女干部4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军区也抽调了一支医疗技术比较强的解放军医疗队（11人）和我们协同工作，并且带去了一部分棉衣，准备救济贫困回民。自治区党委要求我们在公安部赴宁夏调查组的统一领导下，共同负责落实固原地区的民族政策。